

迷惘与求索:苏轼的青春岁月

◆ 崔铭

如果用时下流行的“十六型人格”来分析,苏轼无疑是典型的E人(外向型人格)。他十分喜欢与人交往,善于结交新朋友,有很强的表达欲,而且乐于尝试新鲜事物,具有迅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超强能力。因此,开朗、乐观、旷达,几乎成为苏轼最富标志性的人格符号,这究竟是天性使然,还是后天养成?



苏轼《名二子说》是我们了解苏轼性格最早的可靠文献:轮、辐、盖、轸,皆有职乎车,而轼独若无所为者。虽然,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。轼乎,吾惧汝之不外饰也。

天下之车莫不由辙,而言车之功者,辙不与焉。虽然,车仆马毙,而患亦不及辙,是辙者,善处乎祸福之间也。辙乎,吾知免矣。

文章作于庆历七年,那时苏轼十二岁,苏辙九岁。从文中可见,苏轼是典型的E人(外向型人格),苏辙则是典型的I人(内向型人格)。尚未涉世的两兄弟,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,性格却截然不同,可见先天因素确实存在。

然而,众所周知,人格特质其实是可以改变的,后天因素的力量似乎更加强大。那么,E人苏轼如何做到历尽沧桑依旧保持天性的开朗乐观?刚刚步入社会时苏轼如何看待世界?是否有过迷惘和痛苦?是否有过精神内耗?对于未来有过怎样的思考和准备?如何面对生命中那些不可控的因素?我们不妨从苏轼青年时代的诗歌入手,追寻他的心路历程。

郭纶触动的忧思

苏轼现存第一首诗歌《郭纶》作于第二次进京途中。两年前,他进士及第,却突遭丧,按照惯例居乡守制。如今守丧期满,举家东迁。此次进京,他将被朝廷授予官职,开启仕宦生涯。自幼饱读诗书,深受儒家思想影响,苏轼渴望走出眉山,走向广阔的外部世界,成就功业,实现自我生命价值。然而,他出身于普通市井家庭,生长在偏远的蜀地,无论是外面的世界,还是深不可测的官场,都难免令他心生忐忑。

在旅途第一站嘉州,苏轼遇见了郭纶。郭纶原本是一名弓箭手,曾在边境屡立战功,却没有得到朝廷奖赏,现在嘉州担任底层官吏,年纪老大,穷困潦倒。听了郭纶的故事,苏轼感慨赋诗:河西猛士无人识,日暮津亭阅过船。路人但觉骅骝瘦,不知铁骭大如椽。因言西方久不战,截发愿作万骑先。我当凭轼与寓目,看君

飞矢集蛮毡。(苏轼《郭纶》)

这是苏轼在嘉州写作的唯一一首诗歌。其实,逗留嘉州期间,父子三人游玩了很多地方,也遇见很多人,为什么唯独郭纶给苏轼留下深刻印象,并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?或许正是郭纶生不逢时、怀才不遇的不幸经历,触动了苏轼对未来仕途的隐隐忧思。尽管苏轼笔下的郭纶出走万里,归来依旧壮志不衰,似乎青春无悔,但“日暮津亭阅过船”的特写,仍让人深深感受到生命落空的悲哀。这种思想根基与儒家生命观有关。儒家认为,人的生命必须有所依托,承载着某种社会责任而来,完成某种社会责任而去。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既是社会责任的完成,也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。这种属于儒家知识分子的高远理想,在世俗的认知中,便往往成为“功名利禄”四个字。

生命的其他可能

那么,除此之外,人生是否还有其不一样的可能性?佛、道对此给出了不同观点。《庄子》认为,人生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,生命有它本身的价值,生命价值的体现,不需要任何外在目标、责任和义务。就像一棵草或一棵树,发芽、生长、开花、结果,不曾受到外力的摧折,健康自然地享尽天年,便是生命价值的充分实现。而佛家则认为,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和无常,其根源即自我的欲望、执着和无知。

苏轼从小接受多元化教育,儒家之外,道家、佛家对他都有深刻影响。他生长在佛教气氛浓郁的家庭,父亲和母亲都笃信佛教。在天庆观跟随道士张易简完成小学教育。少年时代第一次读《庄子》,便“喟然叹息曰:吾昔有见于中,口未能言,今见《庄子》,得吾心矣”(苏轼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),将庄子引为异代知己。他热爱自然,喜欢徜徉于山水之间,天性中就有超尘脱俗的倾向,而且过去几年,他两次遭遇亲人离世。15岁时,唯一的姐姐因病去世;20岁时,三月进士及第,四月就接到母亲病逝的噩耗。生离继之以死别,

大喜继之以大悲。这些特殊的经历,使他倍感生命易逝,亲情无价,更加珍惜生命本身的价值。因此,即将踏入仕途之际,前路茫茫、胸怀忐忑,便情不自禁向往另一种人生。在《夜泊牛口》一诗中他写道:

日落江雾生,系舟宿牛口。居民偶相聚,三四依古柳。负薪出深谷,见客喜且售。煮蔬为夜餐,安识肉与酒。朔风吹茅屋,破壁见星斗。儿女自咿嚶,亦足乐且久。人生本无事,苦为世味诱。富贵耀吾前,贫贱独难守。谁知深山里,甘与麋鹿友。置身落蛮荒,生意不自陋。今予独何者,汲汲强奔走。

乡野居民朴实而温馨的生活,也是苏轼过去二十多年极为熟悉的生活。这样度过一生,何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生?为什么要被功名宦情所诱惑,汲汲皇皇,奔走道途?

尘劳世方病,局促我何堪?尽解林泉好,多为富贵酣。试看飞鸟乐,高遁此心甘。(苏轼《入峡》)

旅途中,苏轼不断叩问本心,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?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?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,从嘉祐四年十月持续到嘉祐五年二月;这也是一场漫长的游学,父子三人沿途寻幽揽胜,参访古迹,每一次游览都撞击心灵。

确立自处之道

旅途接近尾声时,苏轼的人生思考终于有了初步结论。在《涪州早发》一诗中他写道:

富贵本无定,世人自荣枯。器器好名心,嗟我岂独无。不能便退缩,但使进少徐。我行念西国,已分田园芜。南来竟何事?碌碌随商车。自进苟无补,乃是懒且愚。人生重意气,出处岂徒。永怀江阳叟,种藕春满湖。

苏轼清楚地认识到,当下的自己仍不可能放下功名富贵之念。那么,该如何自处?如何面对未来的仕宦生活呢?他给自己立定的原则是:第一,“不能便退缩,但使进少徐”,虽然不甘于终老田园,但对功名利禄亦不应汲汲以求。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,过于急切、过于执着,不仅会压抑个性,牺牲健康,少了陪伴亲人、朋友的时间,无心享受生活中的

种种乐趣,甚至可能会丧失做人的底线,变成一个为了成功不择手段的人;第二,“自进苟无补,乃是懒且愚”,出仕为官必须尽职尽责,有所作为,对国家有利,为百姓造福,不可自诩淡薄功名,为自己的懒惰和无能寻找借口;第三,“人生重意气,出处岂徒”,这里的“意气”是指一种信念而有所持守的刚正之气,无论进退,都应该坚守做人的信念和节操。

两种价值观的互补互融

由此可见,早在青年时代,苏轼的人生思想便交织着两条基线。一条以儒家思想为基础,追求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与社会责任;另一条则以佛道思想为基础,敏锐感受和审视人生的空漠,重视生命本身的价值。两条基线从相互矛盾到相互制约,最后达到互补互融,使苏轼的内心世界得以自洽。这一思想特质,在他的名作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中同样有着突出体现:

人生到处知何似?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。老僧已死成新塔,坏壁无由见旧题。往日崎岖还记否?路长人困蹇驴嘶。(自注:往岁马死于二陵,骑驴至渑池。)

诗歌作于嘉祐六年(1061)十一月,当时苏轼正前往他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:凤翔府签判。途中经过他与父亲、弟弟的旧游之地渑池县。嘉祐元年(1056),兄弟俩跟随父亲第一次进京,就曾路过此地。那一次,他们在县里的寺庙借宿,得到老僧奉闲的热情接待,并在寺庙墙壁上题诗留念。短短几年过去,斗转星移,人、事全非!奉闲和尚已经去世,骨灰安葬在庭院中,上面筑起了一座新塔;曾经题诗的墙壁早已颓坏,几乎见不到笔墨的痕迹。

徘徊在奉闲和尚的舍利塔旁,苏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。整个世界生生灭灭,变化不已,没有常性;人有悲欢离合、生老病死,也无常性。“无常”二字主宰着宇宙中的一切。他仿佛看到,茫茫雪原上一只飞鸿疾速掠过,偶一起落间,留下一串爪印。鸿飞千里,瞬时不知去向,而雪花依旧纷纷飘落,爪印也悄然消失,天地依旧是苍茫一片。雪泥鸿爪,倏忽即逝,人生空漠之感扑面而来。

然而,诗歌的内涵却并不止于此。结尾两句忽然宕开一笔,追述往事。嘉祐元年(1056),父子三人从陆路进京,山路坎坷,马儿都累死了,最后只好骑驴到渑池。如果说前六句正面论证了人生的虚无,最后两句则又给这虚无的人生赋予了某种意义和价值。“路长人困蹇驴嘶”展开的是一幅生动的场景描写,透过这个场景,我们可以想象进京旅途中父子三人经历的种种艰辛,他们彼此的鼓励、相互的扶持,怀揣的梦想,沿途的唱和……

这些饱含深情的美好回忆,背后是父子兄弟间浓浓的亲情,这才是速朽的人生中永恒不朽的部分。功名利禄固然无常,但人生绝不是彻底的虚无。结尾两句以转折方式呼应和收束全篇,在承认前文论点的基础上,引出补充性论点,完成对人生意义的圆满解答。整首诗歌否定了功利性人生的价值,肯定了情感性人生的意义。

这时候的苏轼,一方面,正处于事业的辉煌起点。继20岁考中进士,文坛巨擘欧阳修预言他将“独步文坛”之后,24岁又以宋朝建国百年以来最好的成绩考中制科,被仁宗皇帝许为宰相之才。另一方面,他和弟弟从小相伴相知,“未尝一日相舍”(苏轼《逍遥堂会宿引》),如今却不得不远隔千里,一别经年,离别的痛苦充盈着他的胸怀。但雪泥鸿爪的人生感悟,使他具备了一种对事物的独特认知:人生路上,无论悲喜得失,皆如鸿飞千里留下的短暂痕迹,很快便会消失。这一思考,使他不至于在年少得志时忘乎所以,也不至于在悲伤痛苦中长久消沉,始终保持对未来的希望和追求。

经历了青少年时代的大悲大喜,经过了青春期的迷惘与求索,苏轼天性的乐观,初步转化为现实的乐观,既胸怀理想,又脚踏实地。这样一种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,既有儒家思想铸造的锐度和硬度,又有佛道思想赋予的厚度与深度,锐度和硬度使他勇于进取、忠诚刚直,厚度与深度使他富有弹性和韧性,不至于被挫折,并将在未来的阴晴雨晦中不断淬炼,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。

